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经济思想

叶世昌<sup>1</sup> 茅智<sup>2</sup>

(1.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2.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蒋介石以孙中山思想的继任者自居, 却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他在 1935 年发起经济建设运动, 在 1943 年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案, 都流于空谈。他还在《中国经济学说》中提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以抵制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解释具有随意性。蒋介石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发展官僚资本, 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关键词:** 经济建设运动; 中国之命运; 中国经济学说

**中图分类号:** F0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1)08-038-04

## 一、实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 原名瑞元, 学名志清, 后改名中正, 字介石, 浙江奉化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次年入日本振武学校, 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 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 任团长。后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 到永丰舰上随侍孙中山, 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赴苏联考察。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东征军总指挥。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排斥共产党人。同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历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实行不抵抗主义。从1931到1934年, 先后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不断进行反共摩擦。1938年任国民党总裁。

次年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行政院长等职。1943年兼国民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 撕毁和中共签订的“双十协定”, 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任总统。1949年, 率残部退守台湾。1975年在台湾病逝。著作台湾编有《先总统蒋公全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等。

1922年, 蒋介石到广东后, 以非常革命的言论取得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信任。在北伐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关键时刻, 他公开树起了反共旗帜, 在血腥的屠杀中建立起了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他在1931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和国民会议上, 曾公开赞扬法西斯主义, 说法西斯为“统治最有效能者”, “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 是非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sup>[1]</sup>他建立特务组织, 用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蒋介石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自居, 尊孙中山为“国父”, 在讲话或文章中宣传三民主义及孙中山的其他主张。但他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 特别是否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作者简介:** 叶世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金融史; 茅智, 经济学博士, 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企业管理思想、企业文化。

对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他只是重复地主自报土地和地价的办法,而不再提“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宣称“平均地权的精义,就是以和平渐进的方法,一步一步达到土地共有的目的”。<sup>[2]10</sup>。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张包括“发达国家资本”,这里的“国家”是指民主共和国。蒋介石对“发达国家资本”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所发达的国家资本是官僚垄断资本。

蒋介石的经济思想除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外,还曾对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还发表过《中国经济学说》,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经济理论观点。

## 二、经济建设论

1935年,蒋介石在《国父遗教概要》中介绍了孙中山的经济建设主张;同时又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他提出运动的总目标为“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sup>[2]1015</sup>这目标具体分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各有四条。积极方面为: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消极方面为: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在原因(如捐税、产业、法规、劳资关系等);解除阻碍经济发展之内在原因(如缺乏经营方法与人才等);解除阻滞货物流通之障碍(如交通、金融、运销制度等);解除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如愚昧、迷信、保守、缺乏劳动习惯及漠视经济等)。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有:

(一) 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销,悉以合作社为基础,指导并改进之,以达到粮食自给自足的初步目标。一方面增加农业原料之生产量,同时提倡农产之就地加工制造。

(二) 鼓励农垦。鼓吹大规模之移民垦荒与经营畜牧,实施军区屯垦制,利用集团劳力开发农利,恢复并增进牛羊马匹与农村各种副产物(如猪鱼鸡鸭之类)之生产;同时提倡各省所有荒弃土地之开垦与垦作,以地无旷土为目标。

(三) 开发矿产。调查矿产状况及摧残束缚矿产业发展之原因。建议政府改善矿业法规,鼓励矿产投资,扶助矿商之独立经营与自由发展,以辟天然之富源,而容纳众多之劳力。

(四) 提倡征工。赞助政府实施征工制度,鼓励民众参加义务劳动。尤以开发交通道路,修治水利,培植森林,开辟垦地等为征工之基本工作。同时实施兵工政策,与征工制并行,以军队辅助各地征工工务之不足,并为建设地方公共工程之倡导。

(五) 促进工业。对农村简易工业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之简单工业,提倡就农村或其附近按合作系统经营之。对于一般工业,由政府分别保护并奖励之。一面设立劳资调节机关,遇有劳资纠纷,予以公平调处。并须赋与该机关以最后强制执行之权,借以保障企业之安全与劳动之工作。

(六) 调节消费。统计各地尤其农村之消费品种类与数量,力谋供求之调剂。必须消费者尽量自己生产。其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其消费。此项工作,须由当地职业团体及合作社协力进行,并须取得进口同业公会之赞助。

(七) 流畅货运。一方面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畅流之便利;一方面设立各重要地区之主要农产品如棉、麦、米、丝、茶等之公共仓库与运销机关。

(八) 调整金融。鼓励民间储蓄,活泼资金之融通,由政府执行健全之货币政策与汇兑政策,而人民衷诚拥护之。

实现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人才,蒋介石要求各级地方长官积极培养、选拔和推荐各类人才。并提出要“设立专门人才调查登记机关,类别其事务上或技术上之专长,遇有国内产业机关需要专门人才时,总机关应设法介绍供给之,如国内无适当专家时,则介绍国外之专家担任之”。<sup>[2]1016</sup>

两年以后即爆发抗日战争,所谓经济建设运动自然不可能继续进行。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提出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等五项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各项建设之重点,而且为一切建设之先务”。经济建设要以工业化为目标。他说:“不平等条约的撤废,更能使中国以独立自由的地位,迈进于经济独立‘自力更生’的大道。而中国之‘自力更生’,尤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故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今后的中国,必须以“最速的进步,与最大的努力,始可与先进诸国高度的技术与集中的经营,并驾齐驱”。经济建设“要以计画经济和社会立法,使每个国民的生活与生存,都有保障,务必做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之目的”,“实

现民生主义之和平的普遍的革命”。<sup>[2]163-164</sup> 在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享受大众化”只能是句骗人的谎话,而“资本国家化”则反映了蒋介石要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心声。

对于建设计划的制订,蒋介石说:“建国规模、计画,及其树立规模、执行计画的志节与本能,当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教训,与一千几百万方公里的地理环境,参之以世界形势的进化,而体会研求。至于实行,更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而实行之程序,又必须有重心,有基点。”<sup>[2]163</sup>《中国之命运》规划了十年内所需要的人才和物资。各类人才共需约 246 万(1936 年至 1941 年实际培养数为 47 万多)。物资包括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衣服、卫生、矿冶等方面。

蒋介石认为,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要积三十年至五十年之久。所列计划中的数字或不免认为太大,以为不易成功,但比之于中国的人口和土地,实在太少,决不为多。他说只要人们深切领会孙中山的“行易”学说,彻底体认他的“力行”的道理,“将来实际的成绩,或可超过预定之数一倍以上,实至为平常之事”。<sup>[2]167</sup>

《中国之命运》提出了如此庞大的经济建设计划。它的前提是在抗战结束后必须有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但蒋介石要维持一党专政的局面,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惜发动内战,则战后的经济建设计划完全成了空话。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观点,指出战后中国有两个前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sup>[3]</sup> 蒋介石经济建设计划的必然失败,也是命运所注定了的。

### 三、中国经济学说论

1943 年,蒋介石又发表了名为《中国经济学说》的小册子,2 万余字。全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与范围》、《中西经济学说的分别》、《中国古来的经济规模》、《民生主义的经济的道理》和《将来的经济理想》五大部分。以下分别评述其要点。

(一) 中国经济学说的定义与范围。蒋介石说近百年来西洋经济学的流入,以正统派经济学说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为最盛。“中国自己的经济的原理反而没有人讲求”。他对中国经济学下定义说:“从人与物的关系来说,中国称经济学为‘经世

济物之学’。从个体与全体的关系来说,中国称经济学为‘国计民生之学’。我们可以说,经济的原理,就是经世济物的道理,亦就是国计民生的原理。简言之,经济学即致国家于富强之学,亦就是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的境域。”根据这一定义,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范围比西洋的要广得多。实际上,中国原来并无“经世济物”(只有“经世济民”)之说,“国计民生”虽是成语,但也无人称经济学为“国计民生之学”(只有“生计学”),这里说的不过是蒋介石个人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说,无论是儒家,是法家,都讨论人与物的关系,而其讨论都以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欲望的关系为中心,儒家求理性之扩充,法家主欲望之制约。”扩充理性和制约欲望都是为了理性。“所以中国的经济学说以理性为本源,不以欲望为本源。”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确有重视理性的特点,但认为它们都以理性为本源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有许多思想家肯定了人们的思想要受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是第一性的,而思想是第二性的。他又说:“中国的经济学不以一个人或一个物为本位,乃是以人类和社会的全体为本位,与西洋各派经济学说截然不同。”<sup>[2]184</sup> 这确是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

蒋介石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他说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要归功于前贤和先民“经世济物”和“国计民生”学问的高深。“其中最基本的学问和规画,是求国计与民生的合一。”他将“国计”解释为“国防”,因此说:“在中国的经济学说上,国家的任务,一方面是养民,一方面是保民。就养民而论,国计就是民生;就保民而论,民生就是国计,简单的说,就是国防。”<sup>[2]185</sup> 他批评西洋的经济学不过是一种私人企业学或市场交易之学,而中国的经济学则是“民生与国防的统一体”。

(二) 中西经济学说的分别。蒋介石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外国经济学的分别。中国从周公谈到张居正,而以《管子》、王安石、张居正为重点。他的结论是:“这些大经济学家……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之小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他们的目的都是国计民生,都是为国计民生而致力于经济的规画与统制。”“他们的政策都以土地问题为中心。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又都从农工关系和农商关系上着想。”<sup>[2]187</sup> 虽然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以土地问题为

重点,但并不限于土地,《管子》轻重理论就不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蒋介石只是作了简单化的表述。

对于西洋的经济学说,蒋介石简略地介绍了各派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他认为西洋经济学的最新趋势已超越了人类欲望、个人小己、价值学说、利润追求等方面,断言“西洋经济学必将废弃个人自利主义与唯物论,而以人性为本源,以民生为目的,和我中国固有的经济学说将殊途同归”。<sup>[2]189</sup>

(三) 中国古来的经济规模。所谓“经济规模”,实际上讲的是经济思想和政策。蒋介石从养民和保民两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有关思想和政策。养民又分为“养育人民的欲求”和“节制人民的欲求”两方面。前者的“经济计画和经济政策”主要有田制、水利、仓储、交通、气象与土壤。后者的学者讨论和政府政令主要有均产、均赋、均输、专卖、农贷。其结论为:“国家的经济的本务,有两个意义:一是养民之欲,二是制民之欲……前者可以说是‘仁’,后者可以说是‘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古来的仁义之说,决不是空谈。仁义的道理应用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各方面,可以构成各种恰当的制度和政策。”<sup>[2]191</sup>在保民政策中则提出要发展集体农场,实行兵农合一制度。

(四) 民生主义的经济的道理。蒋介石将中国历代相传的经济的道理(又称“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定为三条:“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画为必要”,“民生与国防之合一”。<sup>[2]192</sup>他批评了三种不适合时代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说。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他指出这种学说已经过时,而中国工业落后,“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的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画经济制度”。<sup>[2]193</sup>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时发生的一种病症的观点,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宣称“中国的工业化虽必达于完成的境域,而共产主义所谓阶级斗争,仍永无发生的可能”。<sup>[2]194</sup>

第三种是平均地权。这本是孙中山的主张,蒋介石不能公开反对,但否定了用暴力的办法。他说:“依照历史的教训,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他否定地权分配不均“是古代封建制度的遗留”,认为“是受了工商经济的影响。如果不

从农工的关系与农商的关系上着想,单是用暴力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纵会可以平均分配,很短的时间以后,便会再起不均的现象。”他解释说:中国古代是自足自给的经济。到了近代农业和工业渐渐分化,农家要出卖农作物以购买外来的商品,“商业经济的力量就渐渐的控制农村了”。“所以商业越是繁荣,土地也越是集中,商业资本不流到工业方面去,却不断的流向地价方面去”,造成了农村的土地兼并。因此他认为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就是要从平地价着手,不许商业资本流向土地,“使土地买卖不复成为投资的对象”。<sup>[2]194-195</sup>

蒋介石关于土地兼并的原因的分析存在着时代的错误。富人兼并土地古已有之,西汉的晁错就提出了商人兼并农人的问题,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这种兼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而蒋介石则否定地权分配不均是古代封建制度的遗留,就是企图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他把民生主义土地政策只限于平地价,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原意,特别是否定了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蒋介石还分析了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精义,将其归纳为五条:最根本的意义是以大陆为基点,以繁荣的海港为出口,民生与国防合一;以交通与农矿为最根本的事业;注重人口之平均分配,尤其要充实西北和西南的人口;所建设的工业散在农业、矿业中间,即分散在各地区;要中国海陆平均发展,各地平均发展。

(五) 将来的经济理想。蒋介石称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最后理想是实现《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同”社会。他说:“由礼运所讲的看来,民生本位与计划经济的原则,是达到大同世界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我们的经济理想。”<sup>[2]196</sup>“更没有别的道路”,就是说不能走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道路。蒋介石在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又发表《中国经济学说》,其真实意图于此可见。

#### 参考文献:

- [1]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91.
- [2]蒋中正.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M].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6.

[责任编辑:申凤敏]